

西南联大传奇背后的精神是什么？



仅存八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关于它的著述亦弥漫着传奇色彩。评论家、作家王尧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3月10日晚，《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新书首发暨分享会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作者王尧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南京大学教授傅元峰一起，以西南联大为方法，“观生活之微，问大学之大”。

王尧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在中国的新文化传统里，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教授几乎都是多面手，数十年来，王尧以其多栖的创作实践，努力衔接这一新文化传统。他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上海文学》开设专栏，出版有《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等多部散文作品，并于2020年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民谣》。《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是《钟山》同名专栏文章的集结，延续了王尧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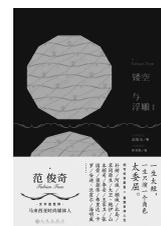
2023年11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常芳著

《河图》是一部填补山东辛亥革命文学叙事空白的长篇小说，它以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独立十二天”为历史背景，以济南和黄河岸边的沂口镇为地理坐标。通过一个革命者及其家人在历史漩涡中的际遇、一个巡

警局长难以言说的家国兄弟情仇、一个在济南沂口铁路桥施工的美国工程师的书信与日记，描摹了一幅革命时期的人间万象图。

作品在历史的碎片中，在偏方、幻术、传说与寓言交互织成的文化记忆中，从乡绅教士到贩夫走卒，每个小人物都深陷生活和信仰的困境，他们的命运共同形成一个时代微缩的云图，也构成了历史的一个个小小漩涡。

这是一段弥足珍贵的民族记忆，也是一部济南沂口版的“世界史”。



2023年2月
后浪·九州出版社
陈钊霖绘
马来西亚范俊奇著

范俊奇，马来西亚吉打州人。新闻系出身，二十五年杂志人。前后当过三本女性时尚杂志和一本男性时尚杂志主编。

2019年，范俊奇在马来西亚深具影响力的《星洲日报》开设专栏“镂空与浮雕”，结合二十多年的时尚媒体业经历，书写文艺界名人。他写人，不是真实记录，反而“半是想象、半是实验”；并用时尚的眼光选取一些看似日常的角度，写出新貌，让人惊艳、共鸣，引起广泛转发。这部集结“时人、时尚、时刻”的散文集，让已渐消逝的传奇人物、美好年代，重回大众眼前，焕发新生。



2023年2月
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何荣著

本书收录何荣中短篇小说16篇。《跟拍》的少年以表演的方式寻猫，在绿化带制造一个虚构的台风眼。《废品》的男人翘了班，跟踪素不相识的老人，因为对方像他走失的父亲。《相交》里，没有犯罪动机的农民工，杀死了素不相识的女高管。

作者以罗伯·格里耶式的速写手法，描摹中国当代的现实场景，以及种种人物。城市的绿化带与夜行列车，或者学校、公园，在事无巨细的描绘中，生活化的场景变得陌生、疏离。而人物带着符号般的名字在场景中浮动，如半梦半醒的气泡，彼此碰撞。

正如鲁迅文学奖得主何平所说，何荣的小说藏着“复调式的交锋”。绒面中带着尖锐，严肃中带着幽默，零度中带着热烈。当16篇这样的作品摆在一起，构成的空间似乎更为复杂。可以沿着一条线索，在不同小说之间穿梭，找到往复循环的阅读乐趣。



2023年2月
中信出版集团
赵鼎新、郅菁 编著

历史社会学关心的都是“大问题”，诸如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非西方世界在“西方崛起”的压力下“被动”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环境、技术、人口、战争和流行病等因素对长时距历史发展形态的影响，等等，对理解改善人类的当前生存条件具有重大意义、对理解当下世界局势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议题。《历史与变革》倡导通过广泛和开放性的交流和讨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能在

海外有较高认可度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并尝试获得对于历史和历史规律的理解。

作为该系列书目的第一辑，《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精选了国内外历史社会学大家及中青年学者对于历史社会学核心问题的思考，包括5篇专著文章、2篇书评，以及1篇圆桌讨论的文字整理。在方法论上，本书既有基于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基于单一案例的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定量研究，也包含了带有社会学视角的历史学研究。本书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方向和较高水准，同时有助于向大众普及历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

现代快报+记者 张奎仟 整理

回到历史现场，聆听日常的弦歌

“之所以有必要从来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分享会上，王尧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在哪里，西南联大没法跨越。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材来自于西南联大，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离开西南联大的基因，它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关于西南联大的著述成果丰硕，如何才能写出点新意？王尧的创作初衷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进入西南联大，“回到困境、欢愉、黑暗、光明、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日常生活中去叙述西南联大，回到人物鲜活的生活里，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日常的弦歌》开篇，不是讲著名的“联大三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而是负责总务工作的总务长郑天挺。在动荡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尤其要让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校舍宿舍如何安置，院系如何调整，面对各有个性的教授们又如何居中调停，消除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这位明清史大家不得不被这些十分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所纠缠，可谓“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

王尧写昆明时期通货膨胀下教授们极度窘困的生活：典卖衣服书籍、营养不良、衰弱生病、儿女夭折，消耗最后的资本——健康和生命。目睹教授们惨况的费正清十分震惊且忧心：“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然而联大人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些细节深深打动王尧：“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活在当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在王尧笔下，堪称伟大和杰出的人物，也有卑微和琐碎的一面：朱自清敏感而自尊，在和豪放不拘小节的闻一多交往时，常有被冒犯之感。但闻一多遭枪杀之后，朱自清第一个站出来要去捐款，并着手整理闻一多文集，一直到生命最后。“和常人们一样，朱自清他们也在一地鸡毛中度过日常生活”，但“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

等小事’，这就是朱自清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境界”。

王尧不是重复“民国之后无大师”的老生常谈，而是将这些人物拉近，镜照当下。朱自清很长时间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也一度兼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现代大学中文系的成熟与朱自清的贡献有关。但他在联大讲授宋诗、文辞研究、文学批评等，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他在日记中记载，“文辞研究”这门课全班只有一个学生王瑶来听课，有一次王瑶缺席，他只好回家洗衣服。他开的“宋诗选”，很多学生也不选。他对经常逃课去泡茶馆的汪曾祺印象不好，拒绝了罗常培让他收汪曾祺当助教的提议，理由是汪曾祺不上他的课。“沈从文经常课上到一半要去查资料，还有一位大师经常忘记上节课讲到哪里……若在今天，他们的教学测评结果堪忧。”

在熟知的西南联大“神话”之外，读者从《日常的弦歌》中看到它的更多侧面，如联合办学的困难、师生生活的窘迫、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坚守、五四运动的余绪等等。王尧对联大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理解，在根本上，他认为“五四”精神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根基，“闻一多不在了，朱自清不在了，他们的校长梅贻琦也不在了。但‘五四’在，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在‘五四’中，西南联大在‘五四’中。”

一个“支棱起来”的精神空间

在傅元峰看来，《日常的弦歌》是一个有支撑力的精神构架，从南渡后教务委员会成立，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郑天挺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了他们生活的困难，讲到了西南联大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整本书形成一个“棱形结构”，有历史时间的单线，但到了1938年那个关键节点，撑大为“胶浆状”，在其中显现了一个难以言明的精神空间。“很多关于西南联大的表达是扁平的，但到王尧老师这里，你会发现它支棱起来了，活起来了。”

“《日常的弦歌》有一个强大的副文本，他只字未提，但这个副文本强大的在那里弥漫，直到把我裹挟进去，每一字每一句仔细揣摩，都包含着当代性，一个学者的热血、情感、焦虑、忧患、思考及其热爱，在字里行间都非常明

显。”

在何平看来，在西南联大的人物群像中，朱自清的个人风采或许并不突出，但《日常的弦歌》中，最打动他的恰恰是写朱自清的这篇。“朱自清整个人生道路是过得不愉快的，甚至有些失意落寞的，但这样一种人往往身上有着‘生活之微’，有他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暗流涌动。”

王尧表示，他有个特别的兴趣爱好，喜欢把历史文献转换成自己的叙述，从而创造一个历史场景，把人物置于其中，让他活动起来。在写作这些文章时，他常有时空错落之感，似乎回到了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在路上遇见朱自清先生了，我停下来喊他，他不认识我，朝我笑笑。老舍到西南联大讲座了，是闻一多先生主持的，我应该去抢个位置。苏州也有定胜糕，我想告诉在街上摆摊的梅贻琦夫人，你做的糕点滋味和苏州的有什么不同……”

以联大为方法观照当下

《日常的弦歌》里处处是当下知识分子特别学院中人格外共鸣的难题：继承“五四精神”提倡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应如何化解教育行政化的危机？教育如何确立自己在时局、政治间的位置？是求经世之道还是做事务家、学问家？要如何引导青年的烦闷向切实长远的实践目标去？“我曾经以为，写完这本书后，许多的困惑会解除，但其实新的困惑又产生了。”王尧认为可以把西南联大作为“方法”来讨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日常的弦歌》呈现了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大学精神共同体的事实。你会发现不同的大学汇聚到西南联大之后，在这样一个条件很差的时空里，大学精神的现代性空前萌发出来，要比他们南渡之前好得多。1946年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脉络和体系当中，但西南联大的精神被保存下来。所以西南联大应该是现代大学精神的最佳源头，是大学的精神故乡。”傅元峰说。

“在30年代末40年代上半期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里，一群人没有被困难压垮，他们扩张出生命的能量和个性，为整个中国的未来保存了精神火种。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本书就值得普通读者打开。”何平说。